

国际环境译丛·第二辑



破坏和破坏者 澳大利亚环境史

SPOILS AND SPOILERS:
A HISTORY OF AUSTRALIANS SHAPING
THEIR ENVIRONMENT

【澳】杰弗里·博尔顿

杨长云 译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国际环境译丛·第二辑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破坏和破坏者： 澳大利亚环境史

【澳】杰弗里·博尔顿 著
杨长云 译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坏和破坏者: 澳大利亚环境史/ (澳) 博尔顿
(Bolton, G.) 著; 杨长云译.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
出版社, 2012.7

(国际环境译丛. 第2辑)

ISBN 978-7-5111-1064-0

I. ①破… II. ①博… ②杨… III. ①环境—
历史—澳大利亚 IV. ①X-09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361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1-0312号

Spoils and Spoilers: A History of Australians Shaping Their Environment, 1788—1980
(ISBN: 978-1-86373-0945) by Geoffrey Bolton

© Copyright Geoffrey Bolton 1981, 1992

First published in Australia by Allen & Unwin Book Publisher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len & Unwin Pty Ltd, Sydney, Australi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2) by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体中文版由 Allen & Unwin Book 授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仅限中国大陆地区销
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丛书总策划 刘友宾

第二辑策划 任海燕

责任编辑 任海燕

文字编辑 赵亚娟 张 杨

责任校对 唐丽虹

封面设计 金 喆

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00062 北京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

网 址: <http://www.cesp.com.cn>

电子邮箱: bjgl@cesp.com.cn

联系电话: 010-67112765 (编辑管理部)

发行热线: 010-67125803, 010-67113405 (传真)

印装质量热线: 010-67113404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00千字

定 价 28.00元

出版前言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错综复杂。目前，诸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主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近年来，环保事业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逐步提升，我国在污染防治、生态建设和保护、环保基础能力提升和环境经济政策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环境保护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很多长期积累的环境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出现，人民群众改善环境质量的呼声日益高涨。

环境问题无国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思考和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必须广泛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理念和有益经验。携手保护地球家园，以开放的姿态不断深化和加强国际环境合作，一直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面。

环境图书出版是我国环保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国际环保交流与合作，传播环保理念与知识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的环境科学出版社，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从2009年开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明确提出将国外环境图书作为一条新的、重要的产品线，推出“国际环境译丛”系列图书，加大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的力度，借鉴国际社会有益的环境理念与实践，以期为推进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呈献在您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国际环境译丛”第二辑中的一种。“国际环境译丛”第二辑包括《莱茵河：一部生态传记（1815—2000）》、《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环境史》、《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毒岛：日本工业病史》、《破坏和破坏者：澳大利亚环境史》和《法国环境政策的形成》等6种图书。这一辑译丛着眼于几个国家及流域的环境开发与利用方式以及环境管理实践，辩证地阐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成本”这一命题。因时间仓促，本辑图书可能还有不少不如人意之处，我们真诚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们不断改进，努力把“国际环境译丛”打造成一条具有广泛影响的产品线。

今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将继续深化产品创新，努力引进出版更多的国外优秀环保图书，扩大国外环境图书的市场覆盖面，为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这些破坏者，这些大地的朋友们。”

乔·比耶尔克-彼得森（Joh Bjelke-Petersen）^①

有了地方议会的许可，
大地的敌人们便会涉足房地产，
他们会在早餐前就吞没一大片热带雨林，
并且正盘算着推平大堡礁。
也就是说，
已用不着艰辛地去挖掘，
这一切都只需在电传室里便可以解决。
大地的敌人们为他们无坚不摧的铁爪而骄傲，
他们变成了真正的白领，
他们了解一切酸甜苦辣。
难道这些真的只是四十年前的事情吗？
他们的确清楚什么样的人人是游手好闲的人。
大地的敌人们也很清楚这些灰尘是怎么来的（在这一片土地上），
它们来自于窗外那“百万元的景观”，
新的高速公路毁了整个河堤（也毁了整片红树林），
一想到这些真令人唏嘘不已。
大洪水仍然有可能发生，
它们将冲刷这剥蚀的地表，
而这将成为大地的朋友们的乐事。
他们背着卡其色的背包，
里面装满了种子，
在拱洞下努力地寻找地缝。
在这样的气候下种子会发芽吗？
某人说：
“绿芽会破岩而出。”

^① In August 1968, conservative National Party leader Joh Bjelke-Petersen became Premier of the state of Queensland. He referred to conservationists as these ‘subversives, these friends of the dirt’.

“不!”

某人写道。

语言，是另一个破坏者，

“如果它发芽了，它会破岩而出；如果它不发芽，它便会腐烂。”

长久以来。

大地的敌人们喜爱斧子，

他们对“高处不胜寒”了如指掌，

他们对受保护的物种有一种突然的本能。

托马斯·沙普科特 (Thomas Shapcott)

致 谢

没有哪部历史学著作会是某个人单独努力的成果，在构思和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感谢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尤其要感谢以下机构和人士：

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院历史学系，以及它的系主任和所有教员，感谢圣约翰学院，同时，也感谢剑桥大学对我的盛情邀请，让我有幸成为该校的访问学者。

感谢阿伦·阿特金森（Alan Atkinson）、格德·马丁（Ged Martin）、乔·鲍威尔（Joe Powell）、洛娜·罗伯逊（Lorna Roberson）、迈克·博斯沃思（Mike Bosworth）和汤姆·斯坦格（Tom Stannage），他们给了我大有裨益的意见和建议。

感谢卡罗尔·博尔顿（Carol Bolton）陪我在位于巴林阿普果园里的小屋中完成了本书大部分的文字，感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感谢梅拉妮·哈里斯（Melanie Harris）和安妮·布莱克韦尔（Lianne Blackwell），她们将我的各式各样的手稿输入电脑，同时，感谢梅拉妮在我的日常工作中帮助我节省了不少时间，使得本书得以最终完成。

感谢斯蒂芬·默里-史密斯（Stephen Murray-Smith）慷慨地为我提供资料，感谢马克斯·凯利（Max Kelly）为本书提供的照片，同时，也感谢新南威尔士公共交通委员会（Public Transport Commission of NSW）和米歇尔图书馆（Mitchell Library）为我提供了不少插图。

感谢希瑟·拉迪（Heather Radi），他为本书的撰写创造了机会。

感谢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Smith）为本书作了索引。

感谢朱迪·赖特（Judith Wright）和耶斯·穆拉伊（Les Murray）允许我引用她们在 *Angus & Robertson* 出版的诗歌；感谢托马斯·沙普科特（Thomas

Shapcott) 允许我引用他发表在《澳大利亚人》(*Australian*) 杂志上的诗作。

最后, 感谢我在莫道克大学的所有学生和同事, 他们参与我的课程讨论, 而这本书便是以这门课程为基础撰写而成的, 我要将这本书献给他们。

再版序言

三十年前，当希瑟·拉迪（Heather Radi）邀请我撰写此书时，作为《澳大利亚经历丛书》之一，澳大利亚环境史仍然还是一个刚刚兴起的学科。这一学科仅在诸如莫道克大学（Murdoch）和格利菲斯大学（Griffith）这样的新兴大学里讲授，即便如此，在这些学校，澳大利亚环境史仍然是相当新颖的学科。在这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里探险，并且要将大量资料压缩为六万字的著作，我不可避免地会犯若干错误，这些错误在本书第一版出版后便被评论者指了出来。在这个新的版本里，我得以有机会对这些错误做必要的修正。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问题成了澳大利亚政治的重要议题。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日益增长，而且，在一些个案中，公众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本书的最后一章已经被重写和修订。

杰弗里·博尔顿（Geoffrey Bolton）

昆士兰大学

1992 年 2 月 25 日

目 录

第一章 永恒的国度.....	1
第二章 英国的影响.....	10
第三章 气候.....	22
第四章 他们憎恨树木.....	33
第五章 第一代.....	46
第六章 城市的开端.....	57
第七章 淘金热之后.....	67
第八章 牧场的影响.....	78
第九章 走向环境保护.....	93
第十章 郊区的蔓延.....	104
第十一章 规划者和改良者.....	116
第十二章 1900—1945 年的乡村澳大利亚.....	130
第十三章 丰裕社会.....	142
第十四章 拯救行动.....	152
第十五章 绿色现蕾.....	162
参考文献.....	172

第一章

永恒的国度

这个永恒的国度，我们称之为澳大利亚。“永恒的国度”这一语意指，在1788年以前，这个古老、贫瘠、由海水冲刷而成的澳洲大陆没有历史。在许多作家的笔下，这片土地处在一个停滞不前的环境之中；与其所受到的任何外部影响相比，这个国度更多地受到西方现代技术的影响。早在1962年曼宁·克拉克（Manning Clark）出版的著作《澳大利亚史》中，他开篇第一句话就说：“直到18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澳大利亚才开始其文明的历程。”三十年前，一位很出色的博物学家H. H. 芬利森抱怨说，要在澳大利亚找到一个其生态平衡没有破坏的地方简直太难了——他认为，在欧洲人到达这里以前，想要以同样的方式找到这样的地方也是很难的。比他早半个世纪的G. W. 拉斯登写道，当船员们看到澳大利亚的时候，“这个广袤无垠、被人忽视的地球角落完全笼罩在一种诡秘的寂静气氛之中。”这再一次证实了这个国度全然表现出一种静止的迹象。^①在1829年时，斯图尔特对里弗赖纳西部的印象是永恒不变的：

这个孤独而荒凉的地区，既没有飞禽，也没有走兽，看上去死一般寂静。^②

不过，作为一个入侵者，他对这个古老而又与世隔绝的环境的反应也能成为希望和动力的源泉。那个偶然发现维多利亚西部大片富饶土地，并将之命名为“澳洲的费利克斯”（Australia Felix）的米切尔（Mitchell）上校声称：

我是这个伊甸园里唯一的亚当。对我来说，这儿的确是天堂。发现这个地方，使我有幸成为探索这儿的山川河流的第一人，使我有幸成为欣赏这儿的美景的第一人，使我有幸成为考察这儿的地理风貌的第一人，而且，最终通过我

^① C. M. H. Clark, *A History of Australia: I*, Melbourne 1962, p. 1; H. H. Finlayson, *The Red Centre*, Sydney 1935, p. 15; G. W. Rusden, *A History of Australia*, London 1883, vol. 1, p. 3.

^② C. Sturt, *Two Expeditions into the Interior of Southern Australia...*, London 1833, vol. 1, p. 59.

的勘察，我也将成为开发这儿的自然物产的第一人，这里所有的一切对于文明世界来说都是未知的。而在不远的将来，可以确定的是，这儿的一切对新来的移民将非常重要。^①

不论是有如米切尔对这儿的着迷，还是有如斯图尔特对这儿的反感，最早来到这儿的欧洲人都持那个时代的普遍看法。他们认为，在一种生态的形成过程中，衡量流逝时间的历史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历史仅仅是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出现才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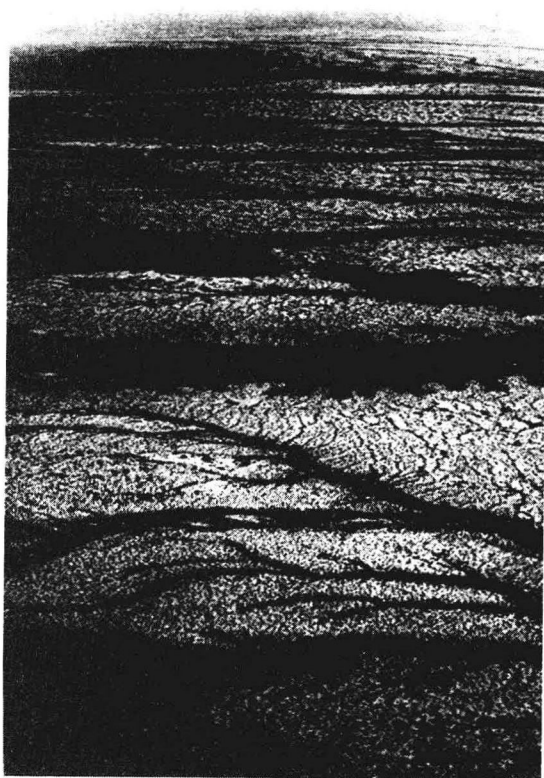


图 1-1 冲积土地

(来源: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the National Estate*,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74)

① T. L. Mitchell, *Three Expeditions into the Interior of Eastern Australian...*, London 1838, vol. 2, p. 170.

在 19 世纪上半叶,大多数的欧洲人对于时间跨度有一种透视感。地质学在这一时期还处在婴儿期,许多人甚至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圣经确定的地球诞生的时间,即公元前 4004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10 点。法官兼诗人巴伦·费尔德(Barron Field)于 1819 年将澳洲描述为一个“胞衣”,他也基本赞同那时候的看法,即把澳大利亚看做最后形成的一块大陆,是在诺亚大洪水之后出现的陆地。不过,1830 年在威灵顿山谷的考古发现已经推翻了这种说法。一位悉尼官员喜上眉梢地告知殖民部:“我们现在有许多方面的证据可以证明,有许多猛兽曾经栖息在这片地区,就这一点而言,这个国度跟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是同龄的。”^①对一些人来说,比如斯图尔特,他们仍然认为澳大利亚的历史最多可以前溯至大洪水时期。评论在新南威尔士发现的内陆海岸线化石的时候,他写道:“随着地质学研究的不断进展,那场可怕的大灾难几乎使人类灭绝的证据日益清晰。”^②

一些学者早已辩称,诸如创世说和洪水说的故事都是“精心编制、糊弄大众的”,^③根本没有提供关于地球年龄的可靠信息。不过,最初来澳大利亚拓殖的先驱者中间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对于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而言,澳大利亚的环境看上去乏善可陈、令人沮丧。或许,他们在那个时候的想法,就如今天几乎每个澳大利亚白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在澳大利亚景观的形成过程中,土著人的贡献微不足道。由于人口稀少,需求不多,土著人似乎不必被迫去攫取地球的资源,也不必被迫去改变其生存的环境;他们没有这样的困扰,同时也没有这样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却是西方人所拥有的,正是这一点标志了文明社会的开始。

甚至早在达尔文的“进化论”被普遍接受以前,欧洲人就往往将澳大利亚土著人置于人类的最低等级。丹皮尔在 1688 年将他们看做“世界上最可怜的人”。^④两个世纪以后,昆士兰的田园诗人沃尔特·斯科特将他们描述为“像动物一样,只有低级趣味;像动物一样,只有粗鄙情感。”^⑤大多数澳大利亚白人都认为,在关于人类完美性的标准中,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处于

① Lt. Col. Henry Dumaesq, 原话引述于: *Journal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1, 1832, p. 2.

② C. Sturt, 前引书, vol. 2, p. 228.

③ J. Whitehurst,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al State and Formation of the Earth...*, London 1778.

④ 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 1652—1715), 英国航海家、探险家。——译者注

⑤ W.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ed. Sir A. Gray, Hakluyt Society), London 1927, p. 312; Walter Scott to Mrs James Winter Scott, 29 May 1872, 原文引述于: G. C. Bolton 'The Valley of Lagoons: a study in exile', *Business Archives and History*, vol. 4, 1964, p. 107.

最高等级，而澳大利亚土著人与南非的布希曼人和南亚的维达人都处于最低等级。^① 澳大利亚土著人几乎被看做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活化石，很像是有袋目动物夹杂于哺乳动物之中，是人类进步主流中一种走到尽头毫无希望的支流。在土著人居住的时期，由于对商业和农业的无知，以及对经济动机的忽视，使得他们都只是满足于游牧生活，仅仅触及了这个大陆的表层。

与之相反，19 世纪的欧洲人却骄傲于他们将荒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田园帝国，变成了一个诱人的黄金生产源，变成了一个辛勤劳动者的乐园，造就了墨尔本和悉尼这些城市的繁荣。如果说欧洲人认为澳大利亚土著人很难被驯服，那么，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尽管这些土著人缺乏文明社会所需要的能力，但他们毫无疑问拥有一种最起码的生存技能，正是这些技能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他们在实践中培养的敏锐的观察力使他们能够以土地为生。他们似乎拥有一种忍耐力，使他们可以接受任何艰难困苦，而这却是欧洲人的体格无法承受的。他们通过一种快速的、暗示性的传心术来进行远距离的信息传递。所有的这一切已为我们现在所熟知，但是，对于大多数来到澳大利亚的白人来说，他们很难明白澳大利亚土著人所取得的成就。在 19 世纪，这两个种族的人们为了争夺这片土地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到了 20 世纪的最初四十年里，大多数人都认识到，澳大利亚土著人成了濒临灭绝的人种，他们只适合生存于那些土著人保留地中。在那个时候，大多数的澳大利亚白人已经是城市居民了，他们更是无法想象澳大利亚土著人适应环境的传统方式，无法想象其精细和复杂性。几乎也没有人认识到，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存在实际上对澳大利亚的生态面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仅有为数不多的人类学家关注过他们，做过一些系统的研究。结果是，在 1930 年以前，人们错过了许多了解澳大利亚土著人如何影响其生态环境问题的机会。

澳大利亚土著社会在与欧洲人的交往中瓦解了，关于他们的大量信息也随之丧失。在白人拓殖澳大利亚之后的短短七年时间里，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土著人便开始“灭绝”，这样说尽管忽视了仍然还有许多族裔幸存的事实，但并不为过。相同的情况在昆士兰北部的鲍恩、新南威尔士南部的摩那罗、海岸平原的天鹅河地区都存在着。^② 在这些地区，想要看到完整的澳大利亚土著人传统社会的景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富有同情心并具有耐心的观察者会采访若干访

① 维达人是斯里兰卡的土著人。——译者注

② G. C. Bolton, *A Thousand Miles Away*, Brisbane 1963, p. 96; W. K. Hancock, *Discovering Monaro*, Cambridge 1972, p. 112; C. Turnbull, *Black War*, Melbourne 1966.

谈者，收集大量口述材料，记下他们可能发现的一切关于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神话和传说，但是，这些被访问者并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往往所答非所问，或者他们压根儿不懂得被问及的这些问题的含义。大多数时候，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民间传说都仅仅被看做是一些生动有趣的、梦幻般的故事，这些东西很少被视作是他们应对环境问题的一种真实叙事。

这种轻视澳大利亚土著人自身文化存在的趋势，可能是由澳大利亚白人所持有的另一种普遍看法促成的，这种看法直到近些年都还能在澳大利亚白人中间发现。这种看法便是，在欧洲白人到达澳大利亚后，土著人与其他种族和文化的联系即被切断了。由于他们与世隔绝，他们可能被视为头脑简单的原始人，无法改进技术以便更有效地开发、利用他们周围的自然资源。如果他们存在正常的外部交往模式——望加锡的印度尼西亚人和巴布亚人已经与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有几个世纪的来往了，至少通过间接的方式和其他中介而接触到了伊斯兰教和中国文化——那么，我们就很难将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文化看做是静态的和不变的。至少，关于澳大利亚土著人对环境的影响这个问题，要确切地阐明已是可能的了。

对澳大利亚进行严肃认真的考古研究已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对于 20 世纪早期的许多异常明智和满脑子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来说，唯一令他们感兴趣的考古研究是对于“高雅”文化的考察：阿瑟·埃文斯在诺克索斯，霍华德·卡特在图特卡蒙墓，这些学者找到一处大的建筑遗址进行挖掘，以图发现具有艺术价值的东西。甚至在那些研究无文字时代文化的史前历史学家也只对那些不再使用石器的社会更为重视，因此，他们贬低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地区的“原始”群落的成就。^①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1952 年，碳年代测定技术得到了改进，使得对手工艺品的时间测定更为精确，填补了前文字时代的文化发展叙事，增强了其可信度。两年后，墨尔本大学开始进行澳大利亚土著人史前史的教学和研究。我们的一切关于澳大利亚土著人如何影响他们的环境的认识几乎都是从这两个事件开始追溯的。

过去的四十年来，研究者们不懈地努力，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得以了解了整个澳洲大陆的情况，从约克角半岛到远西南部，至少在 4 万年前就有

① 关于这一观点，参见：J. Allen, J. Golson and R. Jones (eds.), *Sunda and Sahul: Prehistoric Studies in Southeast Asia, Melanesia and Australia* 1977; S. J. Hallam 'The relevance of Old World archaeology to the first entrance of man into New Worlds: colonization seen from the Antipodes', *Quaternary Research*, vol. 8, 1978, pp. 128-48.

人类在那里定居。只有中国、爪哇、东非这些国家和地区才被发现是如此久远年代的人类足迹。也许这样的发现可以证实，澳大利亚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一样久远。有证据表明，最早的澳大利亚人来自北方，因此，我们有望在金伯利斯或者昆士兰北部发现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远古祖先的遗址。继南部陆续发现了几处古代人的遗址之后，最近人们的视线又聚集到了北部，同时，史前历史学家们几乎每年都会公布一次新发现。

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的是，这些澳大利亚土著人究竟是否同出一源，抑或是在北方的数次移民浪潮中，是其中两支、三支甚至五支不同移民的后代。大部分的遗传学证据表明，所有的现代澳大利亚土著人都是同宗同族，自从他们到达澳大利亚后，才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差异。不过，这些目前还只是一种推测，而这种推测存在的问题在于，目前所能得到的证据不过是对白人来澳大利亚拓殖前土著人总数的猜测，这一猜测显然是缺乏根据的。直到最近，大体上猜测的这一人口总数是 30 万人，但是，有些学者却认为有 75 万人，在这片土地上，每 10 平方公里有 1 人，而另有一些人猜测这个数字超过了 100 万。

澳大利亚土著社会以较小的血缘群体为基础，其社会组织得井然有序、十分有效。每一个小族群——包含 12、20、30 个人已属难得——在具有明确范围的领地内井井有条地经营着本族群。正是在这些有限的领土范围内，他们过着一种游牧生活，这种生活避免了任何单个土地区域的过度消耗，同时，这样不仅保证了他们可获得猎物的生存空间，也保护了草原的再生。有的时候，这些小族群基于宗教或祭祀的目的聚集起来，形成相对大一些的族群，或者为了季节性的犒赏，或者为了分配意外的收获——比如搁浅于岸的鲸鱼——他们也会聚集起来。这种土著社会具有一种灵活性，这有助于他们不论是在极盛还是极衰时期都能够安然度过。在艰苦岁月，他们能够忍受物质匮乏，节俭度日；在丰裕时期，他们则开怀大吃、毫无吝啬。这些人既然能够在社会组织上形成这么一种特质，那么必然也能够采取某些办法来控制人口的增长。有些人将澳大利亚土著人看做是“人口零增长”的最早、最谨慎的实践者，他们将人口控制在与可获得的资源相平衡的范围内。结婚习俗、部落戒律、相当多的堕胎和杀婴，以及在荒年弃儿，所有这一切都限制了人口的增长，从而使得人口对澳大利亚资源的需求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在一千多代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前后相继中，这些控制人口的方法构成了澳大利亚土著文化的核心。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澳大利亚的资源日益变得稀少。昔日的澳大利亚已经面目全非，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澳大利亚了。从第一代澳大